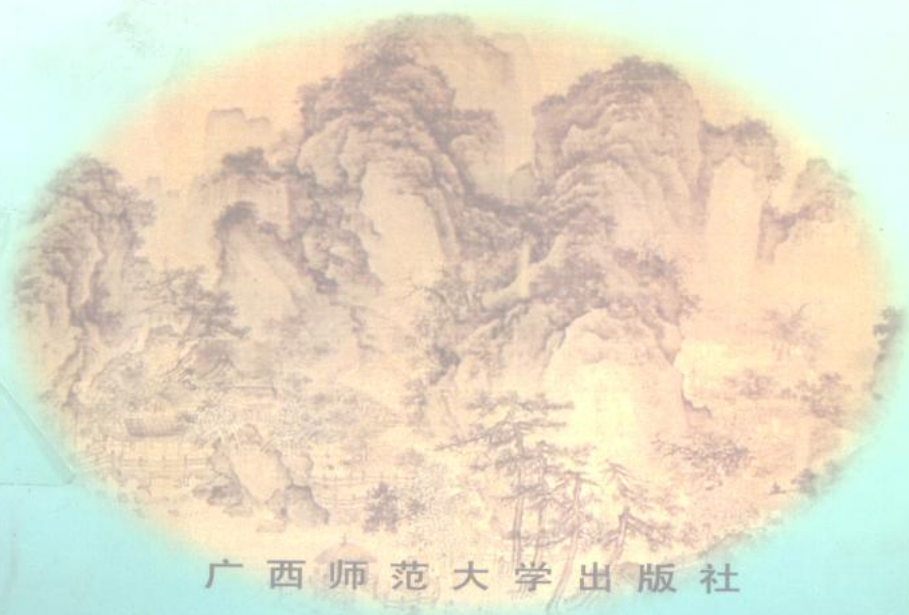


国·学·丛·书·国·学·

● 韩兆琦 著

史记通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国学丛书 ·

史记通论

韩兆琦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DQ42/02

· 国学丛书 ·

史记通论

韩兆琦 著

特约编辑：廖国一 责任编辑：桑林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东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¹/₃₂ 印张：17.625 字数：442千字

1996年4月第一版 199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5633—2112—8/I·143

定 价：25.00. 元

国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执行主编：王 洪

委 员（按国别英文音序排列）：

马克林（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

叶嘉莹（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梁丽芳（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教授）

傅璇琮（中华书局总编辑、编审）

朱靖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党玉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编审）

韩兆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周笃文（中国新闻学院教授）

王 洪（中国新闻学院副教授）

李殿魁（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王保珍（台湾大学教授）

陈耀南（香港大学教授）

黄兆汉（香港大学教授）

冯瑞龙（香港浸会学院副教授）

松浦友久（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

李炳汉（韩国汉城大学校教授）

成元庆（韩国建国大学校教授）

柳晟俊（韩国外国语大学校教授）

朴宰雨（韩国外国语大学校教授）

斯蒂芬·欧文（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萨进德（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

唐凯琳（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教授）

前 言

我是1959年秋考入复旦大学做研究生的,从那时开始,我在蒋天枢老师的指导下系统读《史记》,开始与《史记》结缘,到现在正好是三十五年了。在这说来漫长,而回想起来又似乎只有一瞬的时间里,我学习、研究《史记》的历程大约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9年秋到1962年底,也就是研究生的在校学习期间,这段时间我在蒋老师的指导下主要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开始养成了一种读史的兴趣。第二阶段是从1963年春到1977年底,这时我已经回到我本科学习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这时我除了从事本科古典文学教学,参加或组织教研室里的一些科研项目如编写《中国历代散文选》、《古代文学作品选》、《论衡选注》、《中国文学简史》外,只要有时间,就继续读《晋书》以下的其他“正史”,以及《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到现在,在这段时间里我给本科生与研究生开设了《史记》专题课,并发表与出版了一些有关《史记》的论文与专著。我给研究生讲《史记》是从1978年冬开始,给本科开《史记》专题课是从1981年秋开始,从此便几乎每年都有了。

《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是我研究《史记》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78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史记选注集说》是我给

《史记》作的第一个选注本，1982年江西出版社出版；《史记评议赏析》是我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的第一个论文集，1985年内蒙古出版社出版。此后相继出版的有关《史记》的著作还有《史记赏析集》（1988年巴蜀书社）、《史记选注汇评》（199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史记通论》（199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史记文白评精选》（1992年吉林出版社）。此外，与《史记》有关的著作还有《汉代散文史》（1986年山西出版社）、《中国传记文学史》（199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台湾出版发行的有《史记选注汇评》（1993年文津出版社）、《史记选注》（1994年里仁书局）、《史记博议》（1995年文津出版社）。

《史记》在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确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它跨有古代历史与古代文学两个领域，并兼有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法律、天文、地理、医学等内容。它是先秦文化的总结者、集大成；又是后代历史、文学以及各门学问的分流处。甚至可以这样说：我国后代各种学术的历史没有任何一种不是从这里开头的。又由于《史记》的文字，比先秦著作相对浅显一些，我们把《史记》当作一个台阶，先从这里入门，而后探源寻流，由浅入深，就会容易得多。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感到必须让我国青年一代早一点明确：不仅有志于学习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文学的人应该熟悉《史记》，即使是有志于研究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等各种文科学问的人，也都应该熟悉《史记》。不仅如此，由于司马迁的见识高，思想进步，认识问题深刻，所以《史记》中有一种其他任何古籍所不可企及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其揭示社会规律、社会哲理之广泛，之深入；其人生阅历、人生感慨之深沉，在其他古籍中也是很难见到的。我在校内或校外常和学生说，学《史记》有三个目的：其一是帮着我们认识社会、认识人生；其二是教给我们如何处世、如何做人；其三是通过学习这门课来摸索一点读书、做学问的方法。我这些年的

《史记》选修课就是本着这个思路开设的。

为了加强《史记》爱好者、研究者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同仁之间的相互切磋；为了进一步引起全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对《史记》的重视，我于1987年邀集国内同仁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史记》讨论会，并成立了“全国《史记》研讨会”联络组。随后在联络组的推动与陕西同仁赵光勇、张天恩等先生的努力下，于1988年又在陕西西安与司马迁的故乡韩城市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史记》讨论会。第三次讨论会原打算在西楚霸王的故都徐州市召开，后来由于承办者吴汝煜先生逝世，没有开成，这样我就于1991年又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讨论会。随后吉林师范学院的宋嗣廉先生又在吉林市召开了第四次；安徽师范大学的袁传璋先生又在黄山召开了第五次。今年八月陕西司马迁学会又要在西安召开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的国际《史记》讨论会，其规模、声势真是越来越大了。

在这十来年的过程中，全国研究《史记》的面貌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其一，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不仅文科，而且也包括相当大的一部分理工科；不仅全日制大学，而且也包括相当数量的函大、电大、成人大学自考班等，开设《史记》专题课的越来越多了，粗粗估算，至少不会少于六、七十所。其二，有关《史记》的原著、选注、译文，以及研究《史记》的论文、专著大量出版，其数量之多，可以超过过去两千年的总和。其研究领域的涉及之宽，更为以往所没有。其三，各地研究组织、研究刊物的纷纷出现，其中最令人鼓舞的是陕西省司马迁学会的成立，与陕西一系列研究《史记》的重大举措，诸如编写《史记集成》、出版研究系列丛书、兴办司马迁专门研究刊物等。如今司马迁故乡韩城市的街心立有司马迁的铜像，韩城市的最主要街道与市图书馆都以司马迁的名字命名，陕西师范大学、渭南师专等都设有专门的“史记研究室”，这些都是过去无法想象的。其四，有关《史

记》研究的国际交流，日益广阔、频繁。在我们这些年来举行的《史记》讨论会上，不仅有海峡两岸的同胞，还有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等东西方的贵宾。不仅有会议上的交流，也有会下的互访，更有指说不尽的书信往来、资料赠送。凡此种种，都是令人非常高兴的事情。我们相信，这方面的形势今后肯定会越来越好。

我在1990年出版的《史记通论》，是与同年修订出版的《史记选注汇评》相配套的两本《史记》专题课教材。这两本书与它们的前身《史记选注集说》与《史记评议赏析》都曾被国内与国外的许多院校用为《史记》课教材，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因此1992年这两本书同时都获得了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但相比之下，《史记通论》由于出版时受到的客观限制较多，内容显得偏少，全书实际还不到二十万字，而且印刷的质量也实在太差，因此早在当时我就下决心过几年后另编一本新的，今天愿望终于实现了。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史记通论》新编本，其中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与旧本相同，其余四分之三都是旧本中所没有的。有的题目虽然旧本中也有，但具体文字都已进行了改写，面貌已和过去大不相同。这一切都是从实际需要出发的，因为前些年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今天已经有所发展，有所修改、补充了。在新增加的部分里，《史记的矛盾性》一篇原是1990年我指导的研究生罗琳所写的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因为这也代表我的看法，故请罗琳加以删节，收在了里面。旧本中有几篇是俞樟华同志写的，也有某些部分是俞樟华同志协助我整理的。现在俞樟华同志自己已出了文集，所以他写的篇章此处不再收入；至于他协助我整理的某些段落，则新本改写时仍难免有所借用。此外，《〈史记〉与〈诗经〉〈楚辞〉》一节，是我的学兄张家英所写。

这本书的第六部分，是对《史记》五十篇精彩篇章所作的题评，也就是结合司马迁全人与《史记》全书，对这五十篇精

彩作品所作的综合分析纲要。它既可以给初读者作为阅读《史记》的向导，也可以给研究者们提供某种分析理解上的参考之用，更可以给选修这门课程的同学提供一种写作业、或者写论文的参考提纲。因为其中引入了古今中外许多研究者的评论资料，所以读者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史记博议》，其框架与此大致类似。其前面总体论述部分的篇题与内容，与此互有出入；有的篇题相同，文字是重新写的。《史记博议》的第六部分是“名篇鉴赏”，收入了八篇鉴赏文字，与这本书第六部分的五十篇“精品题评”完全不同。两本书的相同部分，不到全书总字数的二分之一。不过我之所以编成两本分别出版，主要还是因为台湾出版的书，大陆的读者很难见到；而且即使见到了，也会因为价格太贵，无法购买。

刚好在西安《史记》国际讨论会召开的前夕，我编好了这本书，就拿它作为向司马迁2140周年诞辰的献礼吧。

欢迎国内国外的专家以及广大的中青年朋友们对此书提出指正。

韩兆琦 1995.7.28.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	-------

一 关于司马迁其人

司马迁的时代、家世与生平·····	(3)
司马迁的自请宫刑与忍辱著书·····	(18)
司马迁生平简表·····	(29)

二 关于《史记》其书

关于《史记》的真实性·····	(41)
关于《史记》的矛盾性·····	(59)
《史记》书法释例·····	(77)

三 关于司马迁的思想

司马迁的民族观·····	(97)
司马迁的政治理想·····	(106)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115)

司马迁的文学观·····	(130)
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	(142)
司马迁与先秦士风之终结·····	(150)

四 略论关于《史记》的艺术性

《史记》的写人艺术·····	(163)
《史记》的悲剧性·····	(178)
《史记》的抒情性·····	(199)
《史记》的语言艺术·····	(212)

五 《史记》的继往与开来

《史记》与先秦诸史·····	(231)
《史记》与先秦诸子·····	(250)
《史记》与《诗经》、《楚辞》·····	(270)
《史记》与《汉书》·····	(289)
《史记》与《新五代史》·····	(299)
《史记》与我国传记文学·····	(320)
《史记》与我国古代小说·····	(330)

六 《史记》精品题评 (共50篇)

项羽本纪·····	(353)
高祖本纪·····	(359)
吕后本纪·····	(364)
六国年表·····	(368)
秦楚之际月表·····	(371)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375)
平准书·····	(378)
吴太伯世家·····	(383)

越王勾践世家.....	(387)
孔子世家.....	(391)
陈涉世家.....	(395)
萧相国世家.....	(398)
留侯世家.....	(402)
陈丞相世家.....	(406)
绛侯世家.....	(410)
伯夷列传.....	(414)
管晏列传.....	(417)
孙子吴起列传.....	(421)
伍子胥列传.....	(424)
商君列传.....	(428)
孟尝君列传.....	(432)
平原君虞卿列传.....	(435)
魏公子列传.....	(439)
范雎蔡泽列传.....	(443)
乐毅列传.....	(447)
廉颇蔺相如列传.....	(451)
田单列传.....	(456)
鲁仲连邹阳列传.....	(459)
屈原贾生列传.....	(463)
刺客列传.....	(466)
李斯列传.....	(472)
张耳陈余列传.....	(477)
魏豹彭越列传.....	(480)
黥布列传.....	(483)
淮阴侯列传.....	(487)
酈生陆贾列传.....	(492)

刘敬叔孙通列传.....	(496)
季布栾布列传.....	(500)
袁盎晁错列传.....	(503)
张释之冯唐列传.....	(507)
魏其武安侯列传.....	(511)
李将军列传.....	(516)
司马相如列传.....	(520)
汲郑列传.....	(524)
酷吏列传.....	(527)
游侠列传.....	(531)
滑稽列传.....	(535)
货殖列传.....	(538)
太史公自序.....	(542)
附《报任安书》题评.....	(545)

一 关于司马迁其人

司马迁的时代、家世与生平

一个时代同时出现两个极其伟大的人物，一个在政治上，一个在文化上，其建树同时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都在自己的领域里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这种事情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少见，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其少见的，而司马迁与汉武帝就正是这样同时出现的既相克相残又相辅相成的两个极其伟大的人物。汉武帝生于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40年即位，在位五十四年，公元前87年去世。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比汉武帝小十一岁；死于公元前90年，又比汉武帝早死了三年，但从大体上说，司马迁正好与汉武帝相始终，是中国历史上同时出现的一对双子星座。司马迁具体所生活的是怎样一种时代与家庭环境，这种时代与家庭环境对于司马迁思想性格的形成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这几个问题。

一、司马迁的时代

早在刘邦建国的时候，由于秦末连年战争，生产遭到了严重

破坏，农民破产流亡，社会经济凋敝，严重的程度以至于达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的上下普遍穷困的状况。但刘 邦建国后，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注意稳定社会秩序，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惠帝、文帝、景帝的相继努力，使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到武帝初年，经济的繁荣已经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司马迁概括这时的经济形势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挨而不得会聚。”（同上）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了西汉政权的巩固，而且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政治上，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同姓王的措施，使封建的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西汉王朝在政治上达到极盛。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创立于秦始皇，但那时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汉高祖刘 邦重建帝国，在断然消灭了异姓王的同时，又接受“秦孤立而亡”的教训，大量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想借此达到藩屏汉室、巩固统治的目的。可是事与愿违，由于这些同姓诸侯王的辖地过多，又可以自置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吏，可以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己管理军队，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所以形成了一种干弱枝强的局面。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些大诸侯王国的势力也迅速膨胀，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日益严重，终于在景帝时代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定后，朝廷改定制度，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规定诸侯王只征收租税，不管政事，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的力量显著加强。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又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侯王“推恩”把国土分给子弟为列侯。按照汉制，侯国是隶属于郡的，地位相当于县，这事实上就把诸侯王的土地逐渐变成了朝